



李云峰 陈舜卿 主编

二十世纪中国史

(第一部)

西北大学出版社

94
K257
8
2:1

二十世纪中国史

(第一部)

主编 李云峰 陈舜卿

著者 (按姓氏笔划排列)

门秀芳 王国红 刘东社 汪春劼
张天社 李云峰 陈舜卿 赵钧强

西北大学出版社



C
041322

(陕)新登字 011 号

书名 二十世纪中国史(第一部)

主编 李云峰 陈舜卿

责任编辑 陈俊熹

封面设计 郭学工

出版者 西北大学出版社(西安市太白路西北大学内)

经销 新华书店 空军电讯工程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3.25 字数 581 千

版次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50

书号 ISBN7-5604-0567-3/K·84 定价 14.50 元

目 录

引论：二十世纪前的中国与世界	(1)
第一章 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 (1900-1912)	
第一节 世纪之交的国内外形势	(13)
一、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加剧	(13)
二、中国新生社会力量的初步发展	(19)
三、戊戌维新和旧式农民运动的命运	(22)
四、清朝政府的新政改革	(32)
五、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	(36)
第二节 打落皇冠的辛亥革命	(43)
一、孙中山、同盟会与三民主义	(43)
二、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与国会请愿运动	(52)
三、辛亥武昌起义与全国响应	(59)
第三节 民国的成立和民主共和制度的建设	(65)
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65)
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68)
三、民初改革与社会生活的变化	(72)
第二章 北洋军阀的统治与人民的新觉醒 (1912-1919)	
第一节 民主共和制度的蜕变	(80)
一、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的形成	(80)
二、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86)
三、参议院风潮及其构成的变化	(95)
四、内阁风潮与责任内阁制的被破坏	(99)

五、民国初年的政团政党奇观	(105)
六、第一届国会的选举和召开	(115)
七、袁世凯的独裁、称帝与反袁斗争	(124)
第二节 皖系军阀的统治与全国政局	(140)
一、皖系政府的成立和国会的恢复	(140)
二、府院之争、张勋复辟与国会再次遭难	(142)
三、孙中山的护法斗争与西南军阀的破坏	(144)
四、段祺瑞的卖国与独裁	(146)
第三节 中国人民的新觉醒	(148)
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148)
二、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传入	(157)
三、革命风暴的酝酿	(159)
第三章 五四运动与皖、直军阀政权的更替 (1919-1923)	
第一节 五四爱国运动	(164)
一、幻想的破灭：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164)
二、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各地的响应	(169)
三、从六三到六二八	(174)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的崭新风貌	(182)
一、文化思想界的百家争鸣	(182)
二、社会主义思潮的澎湃及走向	(187)
三、关于社会改造和国家出路的论争	(194)
四、新文学革命的丰硕成果	(206)
第三节 军阀混战与直系军阀的统治	(209)
一、华盛顿会议与列强的卷土重来	(209)
二、直皖战争和皖系政权的垮台	(214)
三、直奉战争和奉军败退出关	(218)
四、吴佩孚的“法统重光”和曹錕贿选	(222)
五、国民经济的停滞衰落和人民生活的每况愈下	(229)

第四节	国共两党的建立与合作的酝酿	(231)
一、	从中华革命党到中国国民党	(231)
二、	孙中山的二次护法及失败	(234)
三、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237)
四、	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和初期农民运动	(245)
五、	国共合作的酝酿	(251)
六、	二十年代科学与人生观关系问题的论争	(255)
第四章	国民革命与北洋军阀的溃败 (1924—1927)	
第一节	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国民革命的勃兴	(262)
一、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262)
二、	国民革命的勃兴	(266)
三、	全国政局的演变与两大人民运动	(272)
四、	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与中共的对策	(282)
第二节	全国革命高潮	(287)
一、	席卷全国的五卅运动	(287)
二、	广东根据地的统一和国民政府的成立	(292)
三、	第三次直奉战争与北方的反奉倒段运动	(295)
四、	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299)
五、	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与妥协	(303)
第三节	北伐战争	(316)
一、	北伐的准备和出师	(316)
二、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321)
三、	工农运动的高涨	(326)
四、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334)
第四节	国民党的背叛与国民革命的夭折	(339)
一、	列强的干涉与革命阵营的分裂	(339)
二、	蒋介石集团的“清党”反共	(345)
三、	武汉地区的讨蒋运动和继续北伐	(350)

四、汪精卫集团的“分共”反共	(356)
第五章 国共对垒与局部抗战 (1927-1937)	
第一节 南京政府在全国统治的确立	(366)
一、国民党北伐奉鲁、混战争斗与统一	(366)
二、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	(378)
三、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和封建法西斯制度	(385)
四、南京政府的初期外交	(390)
五、中间政派和国民党内的政治派别	(394)
六、国民党统治下的财政经济状况	(401)
第二节 中共的武装反抗和土地革命	(412)
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创	(412)
二、掀起土地革命的高潮	(422)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和苏区建设	(432)
四、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的胜利	(440)
五、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	(447)
第三节 日本入侵与局部抗战	(450)
一、九一八事变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	(450)
二、一二八事变与淞沪抗战	(456)
三、伪满洲国的成立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460)
四、长城抗战和中间阶层的抗日要求	(465)
第四节 迈向联合抗日之途	(469)
一、华北事变与一二九运动	(469)
二、国共两党政策的调整与合作的酝酿	(476)
三、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缓远抗战	(486)
四、西安事变和全国联合抗日局面的基本形成	(490)
五、中外记者对红色中国的考察	(497)
第五节 三十年代文化思想界的论争	(506)
一、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	(506)

二、中国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的论争	(511)
三、左翼文艺运动及其两场论争	(514)
四、新启蒙运动的开展	(521)
第六章 全民族的抗日战争 (1937-1945)	
第一节 全民族奋起抗战	(524)
一、抗战的爆发与国共再度合作	(524)
二、国共两党的抗战路线	(528)
三、华北抗战	(533)
四、中日谈判的破裂与近卫第一次声明	(535)
五、华东华中的抗战	(536)
六、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和敌后战场的开辟	(539)
七、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国际援华活动	(541)
第二节 坚持团结抗战和反对分裂投降	(544)
一、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与国民党的倒退	(544)
二、正面战场的继续抗战	(549)
三、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554)
四、反对国民党的反共行径	(558)
五、国民党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和宪政骗局	(562)
六、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566)
七、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论争	(567)
第三节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战场	(569)
一、珍珠港事件与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	(569)
二、中国战区的设立	(572)
三、日军的“治安强化”、“清乡”和生物化学战	(575)
四、解放区军民克服困难坚持抗战	(578)
五、制止顽固派的反共叫嚣和武力威胁	(592)
第四节 战略反攻和最后胜利	(596)
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	(596)

二、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缅北的反攻	(597)
三、解放区战场的局部反攻	(599)
四、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一次大溃败	(602)
五、史迪威事件和美国对华政策的逆转	(606)
六、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人民民主运动的增长	(610)
七、代表不同中国命运的两个大会	(615)
八、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620)

第七章 两种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

第一节 内战独裁与和平民主的抉择	(628)
一、战后时局与国共两党的方针	(628)
二、重庆谈判和停战谈判	(633)
三、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成就	(640)
四、国统区反内战运动的兴起	(645)
五、国民党加紧内战部署与中共的准备	(650)
第二节 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657)
一、全面内战的爆发	(657)
二、粉碎国民党的全面进攻	(659)
三、伪国大的召开与国共关系的彻底破裂	(663)
四、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	(669)
五、国统区的危机与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672)
六、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和新疆的三区革命	(680)
第三节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	(684)
一、解放军举行全国性的反攻	(684)
二、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	(688)
三、中共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	(691)
四、国民党的“戡乱总动员”和“行宪”丑剧	(693)
五、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扩大	(699)
第四节 中国民主革命的辉煌胜利	(702)

一、伟大的战略决战	(702)
二、国统区财政经济的崩溃	(709)
三、将人民革命进行到底	(714)
四、人民共和国在炮火声中诞生	(722)
五、历史性的选择和划时代的胜利	(727)
后记	(730)

引论：二十世纪前的中国与世界

《二十世纪中国史》，是将 20 世纪作为一个“断代”、作为一种时空框架，从具体与整体的结合上分析、研究和记述这个世纪中国历史的著作。该书分为两部：第一部起自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民主革命勃兴，迄于 1949 年中国民主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可以称之为中国现代史；第二部起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迄于本世纪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入一个新的阶段，可以称之为中国当代史，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为了更好地学习、理解和把握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就有必要从宏观上追溯和认识这个世纪之前中国的基本情况，特别是 19 世纪 4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中国与世界之间相互关系的演进。下面，仅就这两个问题做一概括地论述。

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无论就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着眼，还是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来说，1840—1842 年的中英鸦片战争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正处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之下。这个王朝一共存在了 267 年（1644—1911），它同以往的封建王朝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只不过它的皇帝（年号先后为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都是满族人，在其统治下满族人享有某些特权。当然，这并不是说满族人之间都是平等的。事实上，所有满族人，包括最高层的官僚在内，都是皇帝的奴才。情况表明，清王朝一身而二任：既实行民族压迫，又实行阶级压迫。若以 1840 年鸦

片战争的开始为界标，清朝的前期 196 年间依然是封建社会，清朝的后期 71 年间则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封建社会源远流长，历经 2000 余年，由于诸种与西欧不同的历史环境和条件而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社会结构。一般来说，作为一个大的系统，社会的内部结构是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亦即意识形态结构）三个子系统的交互作用而组成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以土地的国有与私有相重合为背景的地主经济和小农业与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在主体所属上，它是地主和农民的个体经济，但在很大程度上须受封建国家的支配；二是在经济活动上，它自给自足，“重农抑商”，不求于外。其政治结构是以中央集权为原则的大一统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家族宗法制度相结合的垂直隶属型官僚政治。这种政治的显著特点：一是以伦理等级秩序（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根本，皇帝居于国家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具有统一信仰的封建士大夫（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所组成的各级官僚，只对皇帝负责，或下属只层层对上司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因而没有多少法治可言，主要依靠人治；二是重群体（如家族等）、重国家（即国家机器）而贬抑个人的人格、权利和价值，使大多数人成为工具，而不成其为人。其文化结构亦即意识形态结构则是以孔孟儒学为正统、儒道法佛等三教九流杂揉互补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尤以儒学的“仁—礼”原则为中心思想，以“忠—孝”观念为现实要求，以“天人合一”的合观思考为宇宙观和方法论，以“中庸之道”（无“过”无“不及”）为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以“贵义贱利”为价值观。这种封建文化也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就主体说，它是皇权主义、家长主义和小农意识的综合，本质上保守、狭隘；二是就文化本身看，它以缜密的理论形态规范了伦理等级秩序的和谐一致，反对非“分”超越，所以在本质上又封闭、求同。以上三个子系统互为

因果,相互适应,相互调节,形成有别于西欧中世纪多元型社会结构的“大一统、定于一”的一体化社会结构。就社会结构的整体功能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而论,西欧中世纪多元型社会结构为资本主义的到来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它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温床;相反,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体化结构虽然创造过辉煌灿烂而又令举世称羨的农业文明,但却对资本主义的新因素起着排斥、否定和阻碍的消极作用,成为资本主义产生、成长的不易逾越的障碍。^①这既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保持大一统局面以及长期稳定、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直没有越出萌芽状态的真正秘密所在。

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与在自身单一矛盾运动中完成近代突破的西方不同,当中国与古代揖别之时,清王朝面临的是远为复杂得多的内部矛盾激化和外敌入侵的双重危机。内部危机揭示了中国必须向前发展,冲决封建主义的藩篱,以实现历史性的突破;外部危机则表明,西方列强要征服中国,把中国纳入他们的资本主义体系,而一个国家落后了就要挨打,甚至亡国灭种。中国封建末世就处在这种难以解脱的双重危机交叉作用的困境之中。或许农民起义可以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但单纯的农民战争用血肉换得的不过是改朝换代的历史重演;或许没有外来因素的干扰,中国社会内部业已存在的商品经济的萌芽也将缓慢地过渡到资本主义,但又不知要以多少个世纪的历史灾难作为代价。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没有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历史性的突破,所以外部危机的加深就成了中国步入近代的更为直接的原因。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既是民族的不幸又是历史转变的契机,它在客观上把中国从千年沉睡中惊醒,并以此

^①曹锡仁:《幻想与现实:中国道路》,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6页。

为开端，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固有结构和发展方向。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所带来的剧烈冲击，中国社会终于偏离了原来的轨道，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经济结构上看，外国列强通过逼签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输出资本、设厂制造等特权。外来资本主义各因素的输入，首先使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主要表现为小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逐步被分解，农业的商品化也有所增长，其结果就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如商品市场、廉价劳动力等。）其次，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虽比以前有了较快的发展，但因受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挤和中国传统封建主义的压制，其发展不仅屡遭波折，时起时伏，而且大多数规模狭小，技术落后。再次，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输入，引发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买办资本和官僚资本的两重化发展，两者既相矛盾又相联系，在近代中国经济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然而，尽管中国的资本主义在成长壮大，但居于绝对优势的仍然是封建地主经济和分散的农业小生产经济。这就说明，在经济结构上，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完全的封建社会，而是一个半封建社会；其另一半可以说是“半资本主义”，不过份量很轻。从政治结构上看，外国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又取得了协定关税权、管理中国海关权、领事裁判权（即司法权）以及建立租界、租借地、抵押借款等特权，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命脉，使中国的主权遭到严重损害。清王朝以及后来的统治者尽管在不同程度上保持了自己的权位，但也不同程度地成了列强的工具（既相勾结又相矛盾），这就说明，中国不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社会，而是半殖民地；其另一半可以说是“半独立”，只是比重较小。从文化结构亦即意识形态结构上看，儒学正统和固有生活方式受到无情冲击。随看西方先进文化知识、价值观念的传入，启示中国人面向西方寻找民族和国家的出路。于是，中国传统的

文化结构发生变异，进化论、民约论、民权论、民主共和思想以及西方资产阶级的其他学说，开始取代孔孟儒学在许多人心目中的地位，从而形成一浪高一浪的革故鼎新的社会思潮。

总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很不平衡的畸型社会结构中，各种因素都非常活跃，呈现出交叉性、复杂性、急变性和过渡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当于资本主义阶段，但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畸型的社会形态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它在客观上规定了当时中国的历史主题：一方面，要求反对封建主义；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科学文化，发展资本主义，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另一方面，又必须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民族独立，避免资本主义的祸害。这是双重的历史主题。两者紧紧地扭结在一起，互相勾联又相互制约，决定了当时中国的社会变革和近代化历程，必然会比其他国家更为艰辛、痛苦和曲折。

世界走向中国与中国走向世界

在中国与世界、尤其与西方的关系上，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中国与世界发生了日趋广泛、密切的联系，中国成了全球性国际社会的一员，成了世界中的中国。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此以前中国与外部世界没有联系，也不是说中国一直置身于国际社会之外。事实上，中国与外国、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很早就已有多方面的交通往来。但是，随着中国封建社会一体化结构的稳固和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文明的早熟，中国人过多地沉湎于已有的成就之中，养成了安土重迁、知足常乐和内向保守的习性，缺乏向外部世界追寻先进知识和开拓海外市场的内在动力。因此，对外交往的目的大都出于维护与亚洲近邻小国的宗藩关系和边境安全，或是为满足封建统治

者的奢侈生活而搜求奇珍异宝,却很少从发展对外贸易和社会经济着眼。同时,这种交往总是零星的、偶然的或暂时的,缺乏经常性、连续性或继承性,特别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上更是如此。

在西方,由于多元社会结构的影响以及商品贸易、航海事业和世界性宗教的兴起,欧洲人很快形成一种外向、开放和冒险的性格。尽管中古时期中国的文明程度和发展水平高于西方,中国文化曾对西方有过重要影响,但在走向外部世界这件事情上,却不能不承认欧洲人的起步比中国人早。例如,在中西之间的人员往来上,“从公元166年大秦始通中国算起,之后整整15个世纪中,只见欧洲人‘自西徂东’来到中国,不见中国人‘自东徂西’去到欧洲。”^①其实,直至鸦片战争前,这种单向性的交往状况也没有多少变化。

自15世纪末16世纪初欧亚新航路开通以来,为了扩展海外贸易,积聚原始资本,西方海盗式的殖民者、商人、冒险家纷纷来到东方,闯入中国沿海。从1511年(明正德六年)葡萄牙人初至广州东莞境内屯门岛到中英鸦片战争,在这三个多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中国的综合国力仍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可以与任何新兴的西方势力相抗衡。在此期间,西方势力轻而易举地席卷了南亚和东南亚,却始终未能打破中国的“朝贡”贸易壁垒;武力入侵也有多次,最后都遭到反击而失败。西方商人的海上贸易终被限制在广州一隅,而且只能通过中国公行的“行商”进行。

面对西方势力东来的挑战,中国的反击和限制都意在自卫、自保,自有其不可否认的正义性。但与此同时,中国也丧失了自身发展的一切活力和对外贸易的良机,变得越来越颓废、守旧、落后。当初,西方商业资产阶级热衷于东方贸易,恰是中国走向

^①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页。大秦,一般系指罗马帝国或其在该地区的属地。

世界的契机；而中国又占有南洋贸易的优势，并对东西方贸易握有主动权。如果中国的统治者能趁势积极开拓新的远洋贸易，并善于汲取国际外交知识，灵活地处理对外关系，那么中国就有可能发展成为新兴贸易大国，与西欧诸国并驾齐驱，平分秋色。然而，正当世界贸易由大陆转向海洋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在18世纪中叶英国开始工业革命之后，欧洲的科学技术和政治思想都有重大突破，清朝政府不但闭目塞听，反而与世界大势背道而驰，采取日益严厉的“海禁”政策。长期闭关锁国的结果，中国不仅丢掉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和原来在南洋开辟的许多贸易基地，而且导致包括鸦片在内的沿海走私活动的猖獗，把本来有利的海上贸易变成了自己的包袱；不仅抑制了本国先进的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且使对外贸易由出超变为入超，大大削弱了综合国力，拉大了与西方的差距。更有甚者，由于中国与世界几乎完全隔绝，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益形模糊，以至达到茫无所知的程度。直到1840年中英开战前，清廷还不知道英国在哪里。福建有个举人黄惠田上书说，英国人“由安海放桅而来，其地黑暗，须半月日始出口，方至息辣，过广南境七日而到广东。”如此荒谬的说词，道光皇帝（1821—1850）竟认为是重要情报，特作批示说：“夷船既须放桅，其地又复黑暗，则路径窄狭，有妨挂碍可知。着祁埭等确切查明，据实入奏。”^①这种愚昧可笑的现象，在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中是普遍存在的。

通过鸦片战争，英国用野蛮的炮火轰开了冥顽不灵的清王朝久已关闭的大门，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结束这场战争的中英《南京条约》（1842年8月）是中国对外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除了中国对英割地、赔款、与英国协定关税等内容外，它还硬性规定了双方之间久远的国家关系。主要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3，中华书局版，第1617—1618页。